

完全”(翻修一新)等意义。这些形容词意义在“一心一意”等成语中也有充分的体现。其实,汉语的“二(贰)/两”也具有一些形容词意义,如“二心、贰臣”表示“不同,不专一”等。

这种倾向甚至可以进一步落实到显性形态上。不少语言,如俄语,其中小数目在形态上是形容词,跟名词结合时为定语,而大数目在形态上为名词,跟一般名词结合时像核心成分(Greenberg 1978:285, 共性四十七)。

还有一个相关例子是,大的时间概念如“世纪、年、月、天、小时”都具有名词形式(如“三个世纪、三个年头、三个月、那些日子”等),但是小的时间概念“刻、分、秒”都只有量词性质而没有名词形式。

上述现象显示了作为组成“可别度”因素之一的“数量”概念,它对可别度的作用可以贯穿不同语类范畴。数量范畴本来是个跨词类的普遍认知范畴,如果它对可别度有影响,这种影响贯穿不同词类范畴这一现象也不难理解。又如,作为可别度中另一个因素的“有界性”,“可及性”也都具有跨范畴的普遍性。既然可别度中的某些因素是跨范畴的现象,那么可以推想,可别度本身多少具有一定的跨范畴性。

根据常识分析,我们可以假设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先习得的词类具有更大的可别度。发展语言学和儿童语言研究者一般认为“言语产生的过程,从总体上说,重复着儿童语言发展(个体发展)的过程,而这后者从总体上说又重复着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”(引自李宇明 Peccei 1999 导读)。如果不是以个别词语为标准,从总体上看,儿童早期习得的词汇中,数量最多的是名词,其次是动词,再其次是形容词,最后是虚词(Peccei 1999:3)这个顺序反映了抽象的程度,所指越抽象的词语习得越晚。而所指越抽象的单位范畴,其可别度也越低,这是由人类认知从具体到抽象的特点所决定的。由此可以做出的一个推理:习得越晚的词类在句子中出现越晚。这里面有个自然的过渡阶段,以个人习得过程看,当孩子第一次把两个不同范畴的词组成一个句子时,很自然地会把早就学会的比较熟悉的范畴放在后来学会的范畴前面。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话,这一模式就会沿用下去而成为固定的基本语序。

(未完待续)

全国第六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在青岛召开

全国第六届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。来自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全国近30个院校的100多名专家、学者、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。本次大会的主题是:语言学和符号学的互动,包括下列专题:(1)语言符号学作为学科在中外的建设和发展;(2)语言学在符号学发展中的作用;(3)符号学各流派理论模式及方法论;(4)符号学在语言学发展中的作用;(5)符号的象似性研究;(6)符号与符号系统;(7)符号学应用前景研究。

本次大会共收到书面学术论文64篇,在三个时段的大会发言和两个时段、三个小组的发言中,共有50多位专家学者宣读论文,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。会议学术气氛浓烈,讨论积极,并对一些有争议的议题进行了探讨,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(张德禄)